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1年第2期
(总第17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



<http://acs.whhit.org>

商务印书馆

中國社會學

第 10 卷
第 1 期

2007 年 1 月

中 国 社 会 语 言 学

2011 年第 2 期（总第 17 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编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1年. 第2期:总第17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463-4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68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SHÈHUÌ YǔYÁN XUÉ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1年第2期(总第17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63-4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3/4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语言冲突与活力

- 试论“撑粤语事件”的多维成因 祝晓宏 1
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语言活力比较 山姆·莫罕、王晓梅 11

语言变化

- 中国工业化初期移民语言变化 孙德平 30
元明时期新词语的消亡及原因探析 邢永革 41

语言政策与规划

- “教育部调整汉字写法”的语言经济学分析 祁 毓、田 丹 51
瑞士多语背景下的地方单语制——兼论“语言属地原则” 宫同喜 61
加拿大因纽特语言保护政策分析 王松涛 69

语词与社会

- 台湾华语饮食譬喻透视 陈力绮 79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 邱克威 96

综述

- 敏锐率真 包容务实
——程祥徽先生社会语言学观点述评 曹德和 112
“2011 性别与语言工作坊”综述 赵 芃 131
2012 年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在北语举行 68
“2012 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三届学术论坛”在商务
印书馆召开 95
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 130
致谢 134
《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出版 封三

CONTENTS

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Vitality

<i>Multidimensional Origin of ‘Support Cantonese Event’</i>	Zhu Xiaohong	1
<i>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of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in Malaysia</i>	Mohan Lal Sam & Wang Xiaomei	11

Language Change

<i>Migrants’ Language Change in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i>	Sun Deping	30
<i>Research on the Death of New Words in the Dynasties of Yuan and Ming</i>	Xing Yongge	41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i>An Approach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gulating Chinese Writing”</i>	Qi Yu & Tian Dan	51
<i>Regional Unilingualism in Swiss Multilingual Society</i>	Gong Tongxi	61
<i>Study on the Policy of Protecting Inuit Language of Canada</i>	Wang Songtao	69

Words and Society

<i>A Study of Food Metaphors in Taiwan Mandarin</i>	Chen Li-chi Lee	79
<i>Malaysia and Singapore Mandarin Lexic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Formation</i>	Khoo Kiak Uei	96

Review

<i>Acute, Forthright, Comprehensive and Pragmatic: Review of Cheng Xianghui’s Sociolinguistic Viewpoints</i>	Cao Dehe	112
<i>Review of “2011 Gender and Language Workshop”</i>	Zhao Peng	131

<i>Acknowledgements</i>		134
-------------------------------	--	-----

试论“撑粤语事件”的多维成因^{*}

祝晓宏

提要 粤语为什么能引发一起社会冲突事件? 鉴于事件的多重性质, 本文分别从社会语言学、“国家—社会”框架和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了该事件的成因。本文认为, “撑粤语事件”是地方综合实力弱化的心理反弹; “撑粤语”的心理和行为是地方社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诉求; 而从媒体报道的比例和关键词来看, “废粤推普”则是地方媒体建构的结果。

关键词 “撑粤语事件”; 综合实力; “国家—社会”; 媒体建构; 方言—普通话关系

1. 问题的提出

2010年5月到8月, 广州上演了一场“撑粤语事件”。就我们所见,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次因语言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 参与人数之众、波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前所未见。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詹伯慧(2011)从学理的角度强调“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 推广普通话(以下简称“推普”)并不是要消灭粤语。屈哨兵(2011)也提出, 应该从语言生活、学界学理、社会公众文化、政治等不同层面来看待这次“撑粤语事件”并进行妥善应对。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声音。但是, 他们的分析仍然未能解决一个悬念: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方言能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最终形成大家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

“撑粤语”从民间讨论、媒体论战直到酝酿成“街头”事件有一个发酵的过程。贝克尔(Becker, 1966: 12—13)提出, 一种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包含以下主要阶段: 标定或觉察; 引起广泛关注; 相关组织重视; 被纳入政府行动之中并采取行动加以解决; 解决问题成为有关机构及成员的职业活动, 公众则失去关注兴趣等。以这个标准来看, “撑粤语”从口水战发展成媒体话题

^{*} 本研究受到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项目编号: 10JZD004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东南亚华语常用特色词的懂度研究”(项目编号: 12YJC740158)课题经费资助。本文曾在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8周年庆典上宣读, 先后得到郭熙、郭骏、王晓梅等师友的批评指正, 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 谨致谢忱。

最终升级成群体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逐步社会问题化的过程。

历史上,推普在粤语区从未遭遇如此强大的阻力,至少媒体没有公开抵制过,尽管该地区的推普工作在全国并不突出。如果承认普通话对粤语构成压力,为什么过去人们默许,而现在推普却成为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不独粤语,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等方言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有的更甚。但是,却没有哪个地区会因方言问题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并最终酿成群体事件。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广州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该事件的导火索源自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该提案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州新闻播音类的节目应该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该提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媒体只要如实反映政协委员的本意,问题或许就不会如此严重。但围绕该提案,媒体却造成了汹涌的民意浪潮,“废粤推普”最后却以官方定性的“假新闻”而收场。“废粤推普”这一假新闻又是如何产生的?

“撑粤语事件”是一场因语言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和媒介事件。鉴于论题的多重性质,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社会学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成因。

2. “粤语危机”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在这场事件中,反对者祭出了“保卫粤语”的大旗。仅从口号看,粤语似乎濒临危机。然而,谁也不会忘记粤语曾有的辉煌。上世纪80年代后,粤语及粤语文化大举北上。有学者认为,上世纪后半叶中国语言生活的特点之一就是“粤语北上”(郭熙,1998)。大江南北,以能哼唱粤语歌、说粤语为时髦。粤语也深深地影响了普通话本身,据汤志祥(2000)统计,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入了160多个粤语方言词,普通话中接纳的粤语词近千条。从广东地区保留如此多的粤语电台、电视台来看,说粤语是一种强势方言也丝毫不为过。在如此强势的历史语境中,粤语区的推普不大可能引起强烈的反弹。

但是,说这个强势方言的影响已有所减弱,也是事实,以下几个事实可以证明。

一是讲粤语的人口和粤语使用范围有所缩减。粤语一直是珠江三角洲乃至广西东部的通行语,但是现在广西南宁、玉林、北海的主要语言,已不是粤语,像玉林这样的白话城市已经变成普通话城市。

二是粤语文化衰微,粤语为载体的电影、音乐、戏剧等语言艺术全面不景气,岭南相声、粤语剧种甚至濒临险境。

三是粤语媒体数量减少。

四是粤语进入普通话词语的速度放缓,数量也在减少;相反,越来越多的普通话词语和表达方式进入粤语。

表面上看,粤语当前的局面就是因为推普而造成的。在这场竞争中,粤语的活动空间逐步萎缩,而这也成了人们把矛头对准普通话、对准提案的因由。应该承认,推普在一定程度上确

实阻碍粤语的传播空间,但是语言竞争的结果并非只是语言本身或语言管理者所能决定的。左右语言竞争结果的因素主要有:(1)政治竞争力,主要是政府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有利于哪种语言;(2)文化竞争力,指语言背后的文化是强势还是弱势;(3)经济竞争力,指语言使用人群经济实力的强弱;(4)人口竞争力,指语言人口的多寡;(5)文字竞争力,指某一种语言的文字化程度(邹嘉彦、游汝杰,2001:208—209)。拿这几个因素来衡量,粤语在政府的语言政策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即使民国政府期间,粤语也没有进入“国语”投票议程,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跟粤语本身的复杂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过去粤语的强势与香港的影响力不无关系,但是与“京派、海派”等区域文化比较来看,粤语文化确实不占上风。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语言之间的竞争就是背后经济实力的较量(Coulmas, 1992: 189)。汉语与英语的竞争如此,苏州吴语被上海吴语取代如此,粤语也是如此。过去,粤语作为时髦方言为人仿效,根本的原因还是人们觉得粤语是有钱的象征,粤语代表的广州是经济发展的前沿。

近年来,广东经济发展的劲头已经不如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分地区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表明,广东职工工资已连续多年被其他地区赶超,因为工资增长趋缓,广东的竞争力优势已经减弱(蒋悦飞,2011)。这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粤语的期望值;加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吸引力,也使得人们不再只追逐粤语。在新闻调查中,许多外地人就表明赞成取消粤语播音节目。市川勘、小松岚(2008:195)说得好:“或许外人的观察更为客观:影响语言变化的要素中有一种功用性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功利的、势利的、嫌贫爱富的,它对经济生活的亲和力(较政治生活为大)不容忽视。”语言学家指出,普通话的推广也并非单纯的政治力量可以左右,必须伴随着民众的自觉自愿(郭熙,1999:240)。在这个意义上,将粤语式微单纯归罪于政府也是不客观的。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原因就更容易看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四台还有粤语播音节目;而广州电视台则一度取消方言播音,广东省电视台有珠江、岭南二台,珠江台增加了普通话播音时间,岭南台则只用普通话播音。查阅当时的新闻报刊,也没见有多少抵制的声音。有趣的是,上世纪末诸多内地电视台主持人模仿的“港台腔”,被认为是对普通话的一种侵蚀,但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这也可以视为经济格局变化后的一种自然结果。

作为一个社会的有机体,语言或方言的生命力指数不仅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它的讲话人及其言语社区的综合实力。

该事件中提出的“保卫粤语”,其前提应该是粤语有存亡之虞,但是,粤语还远未达到危机的地步。评价一种语言或方言是否危机或濒危,是有评估标准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2006)发布的“语言活力”评估指标包括:(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4)现存语言使用域的走向;(5)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

就上述第(1)和第(4)项指标看,根据郭熙、刘正文、曾炜(2005)所做的广州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25岁以上人群在“后代语言选择”上选择粤语的占样本总数的59.6%,并且该比例随着样本人群年龄的升高而升高;25岁以上人群在“工作接待语言”上选择粤语的占26.3%,但转到“同事交谈语言”、“家庭语言”项目上,所占比例逐渐升高。从实际情况来说,广州城区会讲粤语仍是入职的一个有利砝码,粤语在各个语域仍然非常活跃。就上述第(2)和第(3)项指标来看,国内至少有6000万至7000万粤语人口,在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社区,仍有6700万人会讲粤语。综合来看,粤语的活力是任何一种其他汉语方言无法企及的(Chen 1999)。因此,宣扬粤语出现“天坑”,粤语濒危乃是言过其实。

强调粤语的文化意义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经济或语言强大并不一定造就文化的强势。上海话并不强势,但并没有影响吴语艺术的繁荣,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不拒绝普通话。所以,文化繁荣有着自身的复杂规律,不能简单化约为语言的强大。

从语言资源的角度来看,普通话应该学习和推广,方言也需要保护和开发。普通话和方言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广州曾是方言调查的策源地,傅斯年、赵元任、罗常培等一批早期的现代语言学家都曾在这里开疆辟土,探索语言资源。这次事件提醒我们,在推普的同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粤语调查和研究中心。

3. “国家—社会”框架下的普粤之争

保护粤语本是学界、媒体和政府讨论的一个学术话题,但却演变成一个社会群体事件。放眼全国,似乎只有粤语敢于和普通话颉颃。“撑粤语事件”成为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为什么粤语在面对普通话的时候,会有如此大的反弹力量?

李宇明(2010)提出,关乎国家认同最重要的是国土、国旗、国歌和国语。普通话是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实质上的国语,自然最能体现国家认同。粤语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粤语实现的是一种地域认同(程美宝,2006)。

从“国家—社会”框架(State-Society Frame)来看,社会和国家总是构成了某种冲突,社会力量的强大往往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削弱(周晓虹,2008)。提出“粤语保护”似乎反映了一种地方对国家的抗争。在这场抗争过程中,以往粤语颇占优势,广东民间支撑粤语的力量也非常强大,但现在已经越来越难“撑得住”。

粤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上世纪之前,粤语在岭南地区通行。这给当时官方政令的推行造成了障碍。清人俞正燮所著《癸巳存稿》记载,在雍正六年(1728),皇帝就因为听不懂福建广东两省官员的陈奏,亲自训谕两省成立正音书院,专门教授官话: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事理之贻误多矣……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多方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务使语言明白,使人

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

但是这一措施收效甚微。四年之后,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奏称,广东人说官话困难,已经学习四年还是一点没有变。“雍正戊申上谕云:各种正音书院,上谕所见,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在地方消极推诿之下,正音书院最后就不了了之(赵振铎,2000:395)。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语在岭南的推广工作进展得也不是很顺利。当时,国家尚未实现一统,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力量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政府推广共同语的命令自然大打折扣。民国政府广东省教育厅(1936)出台了系列针对小学、中学以上以及民众的国语推广法规,但是成效极为有限。一个流传甚广的事情是,因戊戌变法成名的广东人梁启超因为讲不好官话,只被光绪赐为六品官阶,后来跟随夫人学习北平话,才在官场如鱼得水。当然,这只是个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多数人还是缺乏学习国语的动力。

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粤语在广东地区一直处于绝对优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的闽语区、客语区、北部土语区的人们竞相学习粤语(李如龙,2004:287)。共同语在粤语区推广艰难,反过来更助长了粤语的气势和地位。

教育领域的推普形势也不容乐观。尽管许多一线语文教师反映,广东地区学生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因为粤语而影响作文得分,但这也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珠三角地区学校普及普通话工作调研报告》指出:

珠江三角洲十几年前推普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保守的语言观念作怪。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经济往来频繁,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优于国内其他省份,使不少干部群众滋生了方言优越感,甚至把粤方言的地位抬高到同普通话对立的程度(李学明,2010:169)。

粤语的优越感造就了粤语在本地区的强势,其强势地位体现在日常交际、工作场合乃至行政各领域。香港新华社透露,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考察广东省时,曾要求各级干部发表意见。邓小平在总结时表示,“我说的大家不一定全懂,你们所说的,我根本听不懂,在这种语言隔阂下,是无法沟通的”(张育泉,1995:28)。邓公的评价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广东官场,普通话还不是通用语言。

上世纪90年代深入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局面发生改变。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的流动,外来人口的增多、五方杂处的环境需要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保持沟通的顺畅,普通话自然成为不二之选,推普工作因交际的需求自然变得相对顺利。可见,自上而下的推广远远不如自下而上的普及更为有效。

随着普通话以及普通话所代表的力量的日渐强大,广州地方力量难免会有危机感,民间开始悄然兴起粤语危机的论调。实际上,在“撑粤语事件”之前,媒体对于粤语式微的报道已不绝如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对粤语形势的一种忧虑,以及对普通话推广的一种警惕。而在这场较量中,普通话不仅代表国家意志,而且有着更大的使用群体和更广泛的使用功能。

现在回顾一下该事件的导火索——提案。它的出台背景是,增加普通话频道或播出时间是一项政府工作议程,此举是为了迎接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并且是要促使广东电视台卫星上天,以便广东走向世界,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削减粤语节目受到了政府改善城市语言形象与发展经济的推动。反过来看,保留粤语节目并无明显的经济和文化推动力。

这样,就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对比: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期间,上海政府突出上海话,而广州举办亚运会期间,广州政府却突出普通话。出现如此局面,是否说明广州的做法不如上海稳妥或明智?该提案为何遭到民间的强烈抵制?这要联系广州本地的社会特点来看。根据社会学家的看法,在全国大城市中,广州是一个市民社会相对发展的城市,当地有数家开明、开放的媒体,民间和政府积极博弈。

以2008年广州市民抵制建造垃圾焚烧炉为例。此前,其他城市虽有市民抵制建造垃圾焚烧炉的报道,但最后并未影响到政府决策,也未演变成社会事件,而广州市民却最终使得这一决策搁置下来。这一点既体现了广州市民的社会精神,也反映了他们保护自己生存家园的努力。按照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撑粤语也就是在保卫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对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广州政府和国家象征普通话的一种抗争。然而,这种抗争颇有些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意味:一是普通话被虚构成粤语的假想敌;二是粤语代表的力量无力阻挡普通话推广的大势。

不过,撑粤语却是输出民意的一道阀门,它反映的是地方社会力量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利益诉求理应得到关注。人们已经看到在该事件中,广州市及广东省政府对于粤语重要性的明确表态。但是,粤语的重要性使之演变成媒体公共事件这又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4. “废粤推普”的批评话语分析

该事件中,虽然官方一早定性推普废粤是伪命题,但是谣言还是持续发酵,最后扩大成群体事件。这当中,固然有勒庞(Le Bon, 1982)所谓的群众盲从心理作祟,但是媒体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不容低估。

按照奥尔波特(Allport, 1945)的研究,一个谣言的产生要经历削平(leveling)、磨尖(sharpening)和同化过程(assimilation)。削平,是指再传者按自己的理解,削去所收信息中的不合理成分,重新安排某些细节,使之变得“更短、更明确、更容易被理解和传告”。该事件提案本身并未提出要政府“废粤推普”,提案本意不过是配合举办亚运会的需要,增加普通话播音节目,方便外来观赛者。但是随后媒体却舍弃了提案出台的背景,不断强化“取消粤语播音、普通话压倒粤语”的语句,给受众形成粤语告急的印象。

传言再造的第二种常规机制是磨尖,指的是从大量的背景材料中选择数量有限的细节加以知觉、记忆和传播的现象。这一机制和削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磨尖是削平的互补过程。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脱离另一个而存在,削平后的谣言所剩内容不多,必须将其突显出来”(Allport, 1945)。传言中被磨尖的信息与公众的关注程度有关,公众最关心的废粤信息,譬如,

政府有无最新的废粤举措或官方文件,媒体却只字不提,而传言中被磨尖的内容或细节:广州出现天坑、上万人聚集、唱歌挺粤,却不断得到强化。

另外,当地媒体在事件报道中是有倾向性的。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先通过媒体发布出来的,媒体面对报道的材料是有选择的。按理说,围绕着该事件应该有公众、政府、专家多方声音。但是,政府特别是专家对粤语的专业分析被削弱了,而网友和媒体的声音则片面地夸大了,这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也就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在批判学派看来,任何报道都不可能做到没有偏见,新闻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媒体、广告商等集团经济利益的凸显过程(Fowler,1991)。其中,媒体通常都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的。例如,在最开始的时候,媒体就公布了网民对于政协提案的态度数据,以及对粤语和普通话态度的数据,几乎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委员的提案,支持保护粤语。用数据说话看起来非常科学,但是实际上网络民意不一定能反映全社会的真实情况。

社会学研究证明,民意调查不仅反映民意,也能制造民意。当一个人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拿不准时,他就会参考其他人的看法,这叫社会比较。而当民意机构公布的某种看法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时,自然就会左右那些态度中立或暧昧的公众(杨东平,2002:146—147)。本来对粤语没有感情或态度模糊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舆论而改变看法,成为撑粤语的拥护者。因此,严谨的机构一般都会慎重对待民意调查的数据,特别是网络民意,更需慎重对待。另外,调查本身是否科学也值得怀疑。

一项所谓的受众调查竟显示,支持这一建议的人只占20%,反对的人占了80%。笔者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本身就是坊间质疑的一个话题;换一班人来操作这次调查,取样对象略作改变,结果也必然会大不一样。报道此事件的媒体,为了证明80%的人支持粤语,采访了几位曾经或正在靠粤语主持吃饭的节目主持人。这样的佐证,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曲日,2010)。

以媒体人的态度证实粤语支持者众多,无疑没有代表性。应该承认,媒体以及媒体人对于普通话的态度一向是支持的(姚喜双,2003)。因为从相互关系来说,媒体和普通话是一种共生关系:媒体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渠道,而普通话是现代媒体赖以传播的工具。在该事件中,本地部分媒体和媒体人对普通话存在抵制心理,其背后应该有某种利益诉求。

报道该事件的媒体可以分成四类:一是本地媒体;二是外省媒体;三是国家媒体;四是海外媒体。粗略统计显示,在该事件报道中,90%多都是本地媒体的声音,而外省和海外都是通稿或转载。国家级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基本站在推广普通话这一边。

“废粤、取消粤语、保卫粤语”这些颇带刺激性的词语每一次出现,都可能强化公众对事件的关注。所以,媒体对这些关键词的使用,无意中就在建构整个事件的新闻价值。截至2010年12月31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旗下各个报刊“关键词”出现的篇幅如表1:

表 1 广州三大报业集团“撑粤语事件”的关键词使用统计表

三大媒体	“废粤”	“取消粤语”	“保卫粤语”
南方报业网	7	5	7
广州日报网	6	9	6
金羊网	40	37	20

资料来源：笔者使用表 1 中三个关键词在三大报业网络数据库中检索所得。

从表 1 可知，金羊网报道频率最高，其他两报报道数量较少。《广州日报》属党报，跟国家级媒体对于粤语事件报道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羊城晚报集团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媒体，对待粤语存废这样的敏感话题，自然有大肆报道的利益驱动。这似乎背离了一般外人对媒体公正的想象。尹连根、王海燕(2007)以南方报业媒体工作者的身份披露了媒体利益在参与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指出真实的新闻界并非媒体自己宣扬的社会公器，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尽管这些分析不无偏颇之处，但也从侧面说明，废粤推普完全有可能是本地媒体建构出来的一幅图景。

另外，作家在该事件中的态度也颇令人玩味。历史上，像老舍、叶圣陶、夏衍这样一批作家对推普都是积极支持的，并撰文号召(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而像莫言、李锐、韩少功等当代作家在公共场合虽一般不会表示反对推普，但对普通话已保持一种警觉。在该事件中，一些作家和文化名人却明确地站在了对立立场上，反对所谓的普通话侵略，持保护粤语的思想。从思想源头上看，这不过是当代风行全球的后现代思潮的地方表现。后现代主义主张去中心主义、反对一体化，主张地方主义、反对全球化。所以，从统一方言到保护方言，作家或名人在不同时代发出不同声音，不过是精英分子在时代思潮下的具体反应。

总结来看，本地媒体在这场风波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它一方面与作家、知名媒体人共谋，在具体的报道中违反平衡报道的原则；另一方面通过倾向性的报道，影响或强化公众对粤语的认同。客观地说，不独粤语，方言在公共领域的失守是全国现象(薛骞，2005)。与虚构的“汉语保卫战”一样，粤语需要“保卫”也是媒体建构的假象。

所以，对于决策层来说，需要思考到底是哪些人在喊“保卫粤语”的口号：媒体人、广州本地人、新客还是局外人？换言之，挺粤的构成人群应仔细甄别。从新闻报道来看，事件从网络舆论演变成群体事件，青年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说明，青年群体是维护粤方言的生力军，他们虽是普通话学习的引领者，但在情感上不一定完全认同，推普工作应该重点把握这个群体；其次，“撑粤语事件”作为一起语言冲突不过是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本地文化失落问题、外来人口管理问题、失业问题等)爆发的出口，因此各方也不宜将语言冲突扩大化、严重化，遮蔽了事件的实质，从而使语言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5. 结语

“撑粤语事件”平息已一年有余。正如屈哨兵(2011)所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类似的

语言事件未必是“后继者”。因此有必要对该事件的成因做更深层次的分析,以警示未来。为何一种方言会导致语言冲突?“撑粤语事件”的形成主要是区域综合实力弱化的心理反弹,是地方社会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以及媒体构建的结果。粤语保护并不纯粹是语言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国家与社会、媒体利益的多方平衡。

方言萎缩、走向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语言多样性也是众所提倡。对于这个令人困扰的难题,曹志耘(2006)提出,方言应该在接受语言一体化的前提下,在多样性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粤语保卫战”再次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激化。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并存的双言制。不过研究证实,实际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双言(Halliday, 1964)。社区里总是方言强于普通话,或者普通话强于方言。解决的途径是功能分域:在公共领域、工作场合提倡普通话,在家庭和私人场合使用粤语,各美其美,这样或许能实现一体化与多样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6 汉语方言:一体化还是多样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6页。
- 程家宝 2006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广东省教育厅 1936 广东省推行国语教育办法,《广东教育厅旬刊》第4期。
- 郭熙、刘正文、曾炜 2005 广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第5期,133—142页。
- 郭熙 1998 当前我国语文生活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228—235页。
- 郭熙 1999 《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蒋悦飞 2011 广东职工平均工资排全国第七 竞争力下降,《广州日报》,5月5日A2版。
- 李如龙 2004 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载李如龙主编《汉语应用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李学明 2010 《广东语言文字工作60周年纪事》,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宇明 2010 《语言规划续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 2006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范俊军、宫齐、胡鸿雁译,《民族语文》第3期,51—61页。
- 曲日 2010 广州推普不应仅有亚运视角,《江门日报》,7月9日A3版。
- 屈哨兵 2011 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54—62页。
- 市川勘、小松岚 2008 《百年华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汤志祥 2000 论20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第2期,37—42页。
-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 薛骞 2005 方言在公共领域的进与退,《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186—192页。
- 杨东平 2002 《社会圆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姚喜双 2003 《媒体与语言》,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尹连根、王海燕 2007 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当代中国研究》第2期。
- 俞正燮 1937 《癸巳存稿》,上海:商务印书馆。
- 詹伯慧 2011 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对出现“废粤推普”风波的一些思考,《学术研究》第3期,152—155页。
- 张育泉 1995 《语文现代化概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振铎 2000 《中国语言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周晓虹 2008 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社会学研究》第1期,143—164页。
- 邹嘉彦、游汝杰 2001 《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Allport, G. W. and L. J Postman. 1945. The Basic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actions* 8, pp. 61—81.
- Becker, Howard S. 1966. *Social Problems: A Modern Approach*.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Chen, Ping. 1999. *Modern Chinese: Its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ulmas, F. 1996. *Language and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A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British Press*.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ers.
- Halliday, M. 1964. The Users and Users of Language. in M. A. K. Halliday(ed.) 2007. *Language and Society*. Beijing: Peiking University.
- Le Bon, Gustave. 1982.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Atlanta, Ga.: Cherokee Publishing.

Multidimensional Origin of ‘Support Cantonese Event’

Zhu Xiaohong

Abstract Why Cantonese can cause a social event? After analysing the causation of the event from sociolinguistics, state-society frame and CDA in view of the event's proper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o-called supporting Cantonese Event is actually a psychological bounce of regional general strength weakening, the reflex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anti-state and the consequence of regional media's construction.

Keywords ‘Support Cantonese Event’; general strength; state-society; media construction; language relation

(祝晓宏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of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in Malaysia

Mohan Lal Sam, Wang Xiaomei

Abstract Chinese and Tamils are the two major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living in the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Malaysia. Though these two communities come from two different ethnolinguistic stalks, they have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ir migratory history, sub-ethnic composition, language maintenance, activities related to education, maintenance of their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However, they exhibit differential behavior in the present soci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Malaysia. This behavioral heterogeneity with an objective of getting socio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abil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the socio-political and the ideological dominance of the majority group. This paper aims at comparing these two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which may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r of these two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Keywords Chinese; Tamils;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Malaysia

1. Introduction

Malaysia, situated in the Southeast Asia, ha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27 million. In that, 65.1% constitute ethnic Malay, 26% Chinese, 7.7% Indians and others 1.2% according to Census 2000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1). It is evident from the demographic details given above that the Chinese and the Indians¹ are the two major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living in the multi-ethnic,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Malaysia. Though these two communities come from two different ethnolinguistic stalks, as far as Malaysia is concerned, they have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ir migratory history, sub-ethnic composition, language maintenance, activities related to education, maintenance of their cultural and